

浙大“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论坛”回顾

11月14日，浙江大学“求是智库”高端论坛——“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这一学术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共同传递出本次论坛的主题：文化遗产事业应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顾玉才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新时代对文化遗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首先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保护成果要惠及民众；其次，要有发展的眼光，保护与发展并重；第三，文化遗产保护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要做好利用传承，实现从“合理利用”转向“有效利用”；最后，要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利用中的作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归根结底，是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北京大学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对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他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是遗产保护学的重要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首先，遗产价值是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反映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判断。其次，遗产的主观价值源于不同个体、社群或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随时间和环境变化，客观价值基于遗产的存在本身，包括遗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环境。最后，价值评估应根据保护目的确定评估内容和重点，遗产分类定级的价值评估是遗产重要性的评估，保护管理规划的价值评估是保护区划的分级和规划分期的先后，保护方案的遗产价值评估则是所采取保护措施与价值保全关系的分析。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需从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中综合理解，既关注其往昔价值，又重视其当下意义，为价值认知与评

估提供理论支持。

西北大学教授、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赵荣，以西安为例，阐释了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脉保护与传承。他认为，变化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城市更新是城市功能与文明的有序提升，城市文脉是城市在空间地域结构和历史文化特质的表现。以西安市为例，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脉保护与传承，首先，要控制格局，典型保护；其次，要分级保护，留有余地；最后，应保护遗产，传承文明，发展文化，实现标识活化，发挥文化遗产作为精神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参与创新，以“四个结合”“五种模式”推动活化传承，实现活化资源、文旅融合、发展文化的创新发展。未来的文物工作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城市更新中的文脉保护与传承，加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注重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研究，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以《谈文化遗产时代——以遗产价值为中心》为题展开论述。他提到，文化遗产时代是对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子时代等人类历史进程一切时代的总结，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无处不在的遗产化现象，是电子信息时代在物质性方面的重要表征之一。遗产符号化与信息化促进了现代社会产生以来博物馆化保存、展示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生存向纵深的发展，场景化和沉浸式展示、阐释与生态博物馆等是其典型表现之一。考古文博工作的本质在于揭示并共享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美，并引导人及其生存环境向更加丰富多样和道德化方向演化，因此，无论对于遗产本体还是其价值、真实性、代表性和系统性都是其保护、传承、利用等一切工作的前提性要求。

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阐述了当前遗产保护利用的形势与任务。他认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贯彻落实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走出围城，寻找出路与对策。首先，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要求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完善顶层设计，相关部委领导与专家智库丰富了理论内涵；其次，现实中的保护工作仍面临保护资金不足、保护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跨部门跨区域协调不畅、法律制度不健全、科技赋能不充分等挑战；最后，需建立立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强化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以构建更加完善的保护体系。

北京大学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以《文化遗产地如何参与构建文化》为题，立足云冈研究院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与具体问题，探讨文化高地建设的实施路径及文化遗产价值融入当代文化的策略。首先，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针对网红城市短暂繁荣的问题，文化遗产地应超越门票经济的单一模式，注重文化价值的重构和提升；其次，需将考古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展现古典美与当代社会的融合，这是文化遗产地发展的重要方向。最后，面对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当代文化构筑的挑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强理论建设，同时保持文化自觉，思考文化遗产价值重构与当代文化影响方面的作用，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主持人张朝枝以《谁的遗产：乡村遗产化与乡村振兴》为题作报告。他认为，当前多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的“成功”案例常以遗产作为乡村景观的核心特征，出现乡村遗产化现象。首先，政府、学界、国际组织等不同主体推动了乡村遗产的认定；其次，乡村景观是为当下的利用而创造过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人们对乡村的浪漫主义想象，改造后的传统村落往往缺乏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息，出现“房子在人不在”、村民乡村遗产保护积极性丧失等问题；最后，应重新审视乡村主体，明确传统生计方式是乡村遗产存续的保障，居民的本土智慧是乡村遗产保护的基础，身份认同的唤醒有助于提高乡村主体保护遗产的积极性。乡村旅游不需要大产业模式，需要的是主人回归，要建立维持社区居民传统生计得以持续和本土智慧得以传承的社会生态系统。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李颖科，阐述了文化遗产功能重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他认为，文化遗产的属性与当代功能的重构，以及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文化遗产具有聚合性、创新性、文化性、经济性、社会性，

探寻民族瑰宝 赓续历史文脉——《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兰屯市卷》记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古族源研究中心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批准号12@ZH014）重要子课题成果之一，系统展示了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文物考古成果，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揭示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森林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预计出版10卷本，“扎兰屯市卷”为其中第8卷，项目组在吸取前7卷本编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梳理、考察了扎兰屯地区的考古文物资料，系统公布、深入探讨，为研究扎兰屯市的历史文化发展与民族生活变迁提供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对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主要内容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兰屯市卷》以考古学为主导，结合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对扎兰屯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生物遗存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存进行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同时，结合丰富多样的民俗风景照片和手绘插图，生动展现扎兰屯市深厚的历史文化与长居于此的北方多民族的生产、生活面貌。扎兰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端，境内以山地、丘陵、平原、河谷为主，全市总人口约40万人，有汉族、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回族、朝鲜族等20多个民族。考古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流经扎兰屯市的雅鲁河和绰尔河流域已有人类活动。本卷以时间为序，集中展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清时期、近现代不同时期扎兰屯市的考古遗址和珍贵文物，特别公布了项目组在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南木鄂伦春民族乡、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调研的民俗学材料和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研究内容，系统论述了扎兰屯市的发展历史、文物遗迹、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精彩呈现了扎兰屯地区厚重的历史文脉与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进程，为研究蒙古族起源与早期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扎兰屯古代遗址与文物概述

扎兰屯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全市有不同时期的遗址点16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内蒙古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扎兰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6处，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多个历史时期。扎兰屯新石器时代遗物丰富，今存大量石镞、刮削器、砍砸器、石斧、石铈形器、磨盘、磨棒、圆形有孔石器等，项目组通过田野考察，新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浩饶山镇西台村绰尔河西岸的台地上，这些为了了解扎兰屯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扎兰屯地区博物馆现藏多件青铜时期的铜铤，根据形制可将其分为有茎铤和有铤双翼铤两类，前者体现了源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北方地区传统，后者则是典型的中原样式，表明扎兰屯地区青铜时代森林草原文化受到过中原文化的影响。扎兰屯地区是辽、金政权与北方族群对峙的边防重镇，高台子辽代城址、金界壕扎兰屯段是辽金时期重要的军事遗存；当时的扎兰屯还是辽贸重镇，边北村窖藏、西平台窖藏出土了大量钱币，并以宋代钱币为主，另有少量唐代钱币；扎兰屯还出土了数量可观、造型多样的金代铜铤，它们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金界壕是一条土筑长城，是由主墙、马面、副墙、外壕、边堡、护城壕、关城和烽火台组成的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有岭北线和岭南线两条主线，金界壕扎兰屯段属岭南线，上接阿荣旗段，从大河湾镇王家屯村进入扎兰屯境内，途经大河湾镇、成吉思汗镇、中和镇、蘑菇气镇、洼堤镇，最终在哈多河镇沙河村越过罕达罕河，进入兴安盟境内，总里程近170公里。当地文物工作者曾在金界壕遗址采集到灰陶残片、白釉瓷片、黑釉瓷片等，这些遗物和金界壕遗址为研究辽金时期军民生产生活状况、城墙修建情况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元代，扎兰屯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幹赤斤的封地，成吉思汗镇东德胜村出土的鎏金铜鞍桥饰应与蒙古贵族有关。明朝中央政府对扎兰屯地区加强管理，先后设立院里卫、卜喇罕卫、朵颜卫，扎兰屯各地区出土的明代铜铤、各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陶瓷、铜造像等，与其他地区发现的明代同类器物具有相似的艺术特征，展现了“大一统”王朝下扎兰屯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清政府在此设扎兰章京，掌管正蓝、镶红两旗军政，今扎兰屯萃集清代各类铁装饰、铁兵器、陶瓷器、吉服冠顶、首饰妆具等，样式精美、工艺精湛，是清代此地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见证。

扎兰屯近现代文化遗址状况

今扎兰屯市分布着大批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中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为典型代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建成通车，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抵大连，扎兰屯即是依托中东铁

路、以商贸为中介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并成为呼伦贝尔岭东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战略要地。扎兰屯中东铁路建筑群包括吊桥、中东铁路俱乐部旧址、铁道会议旧址、沙俄森林警察大队旧址、中东铁路扎兰屯站旧址、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5师司令部旧址等39处遗址，多为石砌或者砖木建筑，外观风格、装饰细节、色彩设计均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

吊桥位于兴华街道吊桥公园内，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整体由悬索桥和桁桥两部分组成，悬索桥与桁桥形体不同，风格各异，二桥相连，统称“吊桥”，今为扎兰屯市的核心景观。中东铁路俱乐部旧址、铁道会议旧址、中东铁路扎兰屯站旧址、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5师司令部旧址、中东铁路扎兰屯卫生所皆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俱乐部旧址位于中央北路，是一栋具有俄式建筑风格的楼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被当作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处，有不少名人、学者到此参观，2006年改建为扎兰屯市博物馆，现更名为扎兰屯市历史博物馆。铁道会议旧址与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成的沙俄森林警察大队旧址分别位于布特哈北路和继红路，均为具有俄式建筑风格的石木结构建筑，二者现属中东铁路博物馆。中东铁路扎兰屯站旧址位于扎兰屯火车站候车室北，迄今依然是扎兰屯火车站的办公场所。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5师司令部旧址位于布特哈北路，初为中东铁路避暑旅馆，1932年作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前方总司令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5师司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作为铁路职工宿舍，现为扎兰屯博物馆临时展厅。中东铁路扎兰屯卫生所目前为扎兰屯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办公处。

扎兰屯市中东铁路建筑群拥有百余年历史，2013年作为扩展项目，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这些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其中不少至今仍可使用，形成了扎兰屯市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进一步促进了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扎兰屯多民族文化融合共生

扎兰屯地区生活着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众多民族，扎兰屯市下辖3个民族乡——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达斡尔民族乡、南木鄂伦春民族乡，当地的民族同胞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迁居至此。项目组经过实地考察、采访调研发现，直至今日，他们日常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包括生活方式等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位于扎兰屯市西南部，聚居于此的鄂温克族仍保留着萨满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跳野猪舞，制作民族手工艺品“太阳花”销往各地，增加收入；这些与扎兰屯现存的近现代鄂温克族桦树皮器、袍皮服饰、萨满服等物质遗存，共同勾勒出萨马街鄂温克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形式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面貌。达斡尔民族乡位于扎兰屯市东部，当地的达斡尔族亦保留着民族传统节日抹黑节、罩鱼节、曲棍球、围鹿棋作为达斡尔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智力竞技项目迄今仍然流行。南木鄂伦春民族乡位于扎兰屯市西北部，南木鄂伦春族也热衷于制作并使用桦树皮器、袍皮服饰等，因其临江河而居，所以生产的民族服饰不仅有兽皮制品，还有鱼皮制品；他们历年都要举办篝火节，也是沿袭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

扎兰屯市拥有一批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10类、116项。其中，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项，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野猪舞、扎兰屯剪纸、羽毛画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工艺、布特哈元宵节灯会、蛇伤疗法等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扎兰屯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汇聚、交融的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多地域人群和谐共处、文化习俗交相辉映的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扎兰屯市各族人民秉承团结奋进、平等友爱的发展理念，彰显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人文特性，将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点缀在扎兰屯广阔的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新的民族团结华章。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兰屯市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了解扎兰屯市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and 学术参照，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动呼伦贝尔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还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当地的历史文化，提升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2024年11月，《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兰屯市卷》荣获第34届“金牛杯”优秀美术图书铜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该书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批准号12@ZH014）项目组在呼伦贝尔地区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可。此书与《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前7卷本一样，图文并茂，序言和概述部分、遗址和文物的名称均为中、英文对照，以扩大本卷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解中国北方地区历史文化的窗口，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执笔：刘国祥 白劲松 王珏 石婷婷 陈桂婷 寇钰洁）

对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最小干预』的认识

林戈 李奇

其中聚合性表现为具有身份认同和文化凝聚作用，强调文化遗产诞生于创新，传承也需以创新为支撑；其次，文化遗产的当代功能重构要加强传播，注重挖掘遗产知识、弘扬遗产精神、彰显遗产价值，要强化利用，外化、活化、转化遗产资源，让隐性资源显性化，用高科技手段活化文物，将遗产资源转化为资产；最后，要从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等四个方面，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上海大学教授徐坚以弗兰德斯中国劳工营的发掘、研究和阐释为例，阐述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的理念转变。2019年始，上海大学与比利时弗兰德斯战地博物馆、根特大学联合开展一战时期中国劳工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重新发现了这一消失的历史和被忽视的文化遗产。基于此案例反思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关系，既往研究过度强调文化遗产的客观而恒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相对忽视文化遗产的后生命史和时代价值，造成对文化遗产的存续路径的误读。他认为，只有回应时代需求，拥有时代价值，让文化遗产转变成为文化资源，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两场主旨报告分别由浙江大学教授、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颖岚，复旦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杜晓帆主持。

圆桌论坛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研究员主持。来自相关高校的教师、学报和文博期刊编辑在“青年智慧”“学术传播”“公众共享”版块，就青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作用、学术期刊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传播中的作用、文化遗产公众共享的参与途径与实施效果等议题展开探讨。

论坛闭幕式环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作学术总结，他认为“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步创造了研究交流的平台，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全面认识、深入研究、有效传承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执笔：魏泽辰 洪艾 资料整理：李静宜 王佳悦 程利萍 许奕敏 王海洋 唐媛媛）

陶瓷文物是文明的见证物，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陶瓷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受中国传统古玩修复思想和以布兰迪修复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共同影响。前者讲求掩盖病害，力争以完好示人，存在改变文物真实性的嫌疑；后者因为文化差异和文字翻译的障碍，被简单理解为“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再处理”三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两者混搭，又产生了“修旧如旧”“远观一致，近观有别”等原则。以上理论与原则多晦涩难懂，缺乏可操作性，运用到材质兼容性能较好的陶瓷类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中时，容易出现不该干预的干预过度，该干预的又干预不到位，短短期效果而不顾长期影响，重遵循原则的教条或重追求完整的随意而不顾价值损失等情况。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实践亟须科学、先进、易理解、能操作的理论作指导。

笔者认为深刻领悟“最小干预”原则的内涵，并落实到每一项保护修复实施工作中，陶瓷文物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

“最小干预”原则的内涵

保护是稳定文物现状，延缓文物材料劣化进程的行为；修复是在保护基础上呈现文物应有价值的行为。两者在传统手法上都是要对文物本体进行干预，只要是干预行为就会对文物现状造成影响，发生外观或材料结构上的改变。出于文物真实性是最大价值的考量，这种干扰越小越好。但是，“最小干预”不能简单等于不干预或少干预，而是站在赋予文物更长久生命价值的角度，评估病害与保护修复行为对文物材料和价值的影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破碎了质地坚致的陶瓷文物，病害并不会导致本体劣变，但是，就目前状态，在日常保管过程中，碎片很容易出现遗失而加重病害程度，而且器物不成形，整体面貌不清晰，价值就无法呈现。如果使用粘接剂将其粘接起来，虽然会对断面造成干扰，但是碎片不易遗失，同时可呈现出器物的现实面貌，再以此基础进行补全，外形和装饰变得清晰，更利于呈现价值。

由此可见，为了在某种必要的干预与最小限度地损害文物潜在具有的各种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才产生了“最小干预”原则，它是最小的必要干预的简称。

“最小干预”是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

“最小干预”敬畏历史，尊重物的生命，现状与价值，是文物得到合理保护的核心原则。相比之下，其他几项耳熟能详的原则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或混淆。一件文物在旧时光里的状态已逝，无法精准复现，所以“修旧如旧”如水中捞月，无法兑现；保护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必定要选择易再处理的技法及材料，为未来最小干预留下空间，所以“可再处理性”已经包含在“最小干预”之中。本质上，所有保护修复痕迹都是可识别的，一般人识别不了的，熟悉保护修复工艺的专家是可识别的；肉眼识别不了的，通过相关仪器是可识别的。而且，“可识别性”的存在，容易成为保护修复工艺不到位、不协调的借口。更为重要的是，在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的实践中，如果陶瓷文物的破损过程具有核心价值，如景德镇明代早期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物，是在当年出厂遴选制度规定下，经检验淘汰后，为了防止其流落到民间，被人作为砸碎掩埋的。那么，保护修复这批文物的时候，在粘接成形后，需要通过分析裂缝与破洞形态来确定当年砸碎的方式，并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保留砸碎形成的痕迹以证实这种御窑厂产品遴选处理制度，这是它们需要清晰呈现的核心价值；相反，如果一件陶瓷文物胎质坚实紧致，釉色纯净透亮，造型古朴典雅，彩绘色妍精美，只是发生了轻微破损，特别是没有发生缺损，而且传世经历简单，那么这个时候，恢复器物的完整性及艺术性，力争达到不可识别的效果，充分呈现出陶瓷特有的艺术价值就是保护修复“最小干预”的目标。通过以上两个案例说明“可识别”和“不可识别”都是保护修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预设的原则要求。

“最小干预”原则在陶瓷文物保护修复中的贯彻落实

要想实现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的“最小干预”，就要把它贯彻到决策与实施的全过程。

在时间上，它能通达保护修复对象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对文物过去的“最小干预”就是对其经历进行充分探寻，寻找对其材质变化、表面附加、外观破损等现状造成过影响的人的行为，提炼出基本价值；对文物当下的“最小干预”就是对其现状进行充分检测评估，确定对其材料稳定性、利用安全性、价值可读性造成影响的因素，结合时代要求、社会发展等条件，形成核心价值；对文物未来的“最小干预”就是确定相对最优的保护修复方案及技术路线，选用稳定易解的保护修复材料，保证实施工艺的精良和适度，消除病害风险，呈现核心价值，做好档案和预防性保护工作。

在空间上，它能涵盖保护修复的整体流程与局部细节。清洗、加固以局部试验为先，物理性处理优于化学性处理；多碎片粘接以无胶试拼定位为先，后在断面涂抹少量的慢干型粘接剂进行正式处理；补缺后在补配材料没有完全固化时就进行整形；作色调制的颜料色度低于本体颜色等。

综上所述，以现状调查与价值评估为基础，以稳定材质与呈现价值为目标，以精准实施与逻辑清晰为要求，以档案记录与预防措施为保障，便可将“最小干预”原则贯彻始终，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理论与实施体系，实现陶瓷文物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利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